



荣昌区濑溪河，新老施济桥相互「陪伴」。

记者 谢智强 摄/视觉重庆

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

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⑧

通衢古道在昌州 地接巴渝据上游

核心提示

从大足邮亭驿沿成渝古驿道一路向西，便进入现在的荣昌区境内。

据《荣昌县志》记载，荣昌境内的成渝古驿道自东向西经过石盘铺、峰高铺、梧桐铺、板桥场、底塘铺，再沿濑溪河跨越施济桥，过高瓷铺、广顺场、瓷窑铺、安富铺进入与隆昌交界的五福乡，全长52.5公里。

与此前的山高坡陡不同，以浅丘地形为主的古驿道荣昌段豁然开朗，呈现出与四川平原相似的一马平

川。《荣昌县志》又载，境内的古驿道宽1.5—2米，挑夫、骡马等相向而行，不须让路。

荣昌古称“昌州”，素有“重庆西大门”之称，共有9个镇街与四川的11个镇街相邻。清代荣昌教谕谢金元曾用“地接巴渝据上游，棠香自古属昌州”的诗句，道出了荣昌重要的地理位置。

正因为此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和客商云集的重镇，荣昌安富更是成为成渝古驿道上著名的“五驿四镇三街子”中的“四镇”之一。

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安富老街。

（荣昌区安富街道供图）

辛亥革命时 成渝军政府在这里合并

□本报记者 龙丹梅

作为成渝古驿道上“五驿四镇三街子”中的“四镇”之一，安富自然不平凡，辛亥革命时期的成渝军政府合并就发生在这里。

“这里现在是街道办事处，过去就是禹王宫的所在地。”6月9日，曾在安富工作多年的《荣昌窑》编纂者薛小军，指着安富街道办事处的前楼告诉记者，1912年，当时的重庆蜀军政府和四川军政府就是在这所禹王宫举行了会谈。

“成渝军政府为何在安富会谈？这就要从张培爵说起，他就出生在荣昌的荣隆场……”在薛小军的讲述中，时间仿佛又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岁月。

1906年，加入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张培爵，一面积极组织发展同盟会成员，一面谋划武装起义，但接连几次均以失败告终。不久后，张培爵回到重庆继续发展革命队伍，成为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核心领导人。

1911年，著名的武昌起义爆发。1911年11月22日，重庆地区的杨沧白、张培爵等率众人揭竿而起，一举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。起义成功，重庆宣布独立并成立蜀军政府，张培爵被革命党人推举为蜀军政府大都督。

同年11月27日，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，蒲殿俊和朱庆澜任正副都督。12月8日，两人在校场阅兵时，发生士兵索饷哗变，蒲、朱二人逃跑。时任军政部长尹昌衡率领新军人城平乱，后来被公推为四川军政府都督。

“这样一来，四川就有了两个军政府。”薛小军说，事实上，当时的蜀军政府形势一片大好，蜀军政府成立后，在蜀军政府支援和影响下，川东南各地也纷纷起义，共计有57个州县宣布接受蜀军政府领导。但张培爵为了避免因内战引起纷争，为了民族大义，主动约四川军政府商谈合并事宜。

如今，在位于荣昌城区的张培爵纪念馆内，对于这场会谈只记载了短短几句：“1912年1月中旬，蜀军政府派朱之洪，四川军政府派张治祥，为各自全权大使，在双方辖区边界荣昌烧酒坊举行会谈，商议成渝军政府合并。”其中的“烧酒坊”就是荣昌安富。薛小军说，据考证，双方会谈的所在地，就是当时安富镇上的禹王宫。

这场会谈结束后不久，1912年3月3日，成渝军政府正式合并，大汉四川军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，张培爵主动将正都督的位置让给尹昌衡，自任副都督。

后来，张培爵积极发动革命讨伐袁世凯，于1915年初被逮捕。面对袁世凯的威逼利诱，他始终坚强不屈，最终遭难于狱中，年仅39岁。

张培爵领导成立的蜀军政府尽管存在不到半年，但后人考证认为，它在结束清王朝对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、传播民主思想等方面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



檬梓桥附近的三尖角，以前是东大路上的繁华路段。

记者 谢智强 摄/视觉重庆



安富街道陶宝古街。

记者 谢智强 摄/视觉重庆



广顺街道高瓷陶瓷厂，工人用古老的技艺制作陶器。

记者 谢智强 摄/视觉重庆

学术支持：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



重走成渝古驿道 系列报道 扫一扫 就看到

施济桥 清代曾被誉为“东川保障”

6月8日，记者从石盘铺经过峰高铺、梧桐铺一路往西，所过之处高楼林立、道路纵横，早已不见东大路的遗迹。同行的荣昌文史专家廖正礼告诉记者，过去，从峰高铺一路到安富铺，大约有15座石牌坊。清朝道光年间，王梦庚升任重庆知府，经过荣昌时曾写下五律《荣昌道上》，其中“试问荣昌道，长亭接短亭。鸿雁呼岸白，道逼远山青”写的便是当时荣昌境内东大路的景象。

荣昌城西，濑溪河上，一座石拱桥静静伫立。这座桥就是建于北宋仁宗年间的施济桥，它是成渝古驿道的必经之地，在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、重庆地理地图书店2014年出版的《重庆古桥地图》中，施济桥被誉为重庆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石拱桥。

从远处看，这座桥长100多米，有7个桥拱。桥身两侧长满了杂草，其中一个桥墩上还长着一棵黄葛树。走近桥头，入眼的是一块“严重危险桥梁”的警示标志。水泥桥面上，只有散步的人行。

史料记载，桥头曾立过一块碑，上书“东川保障”四个大字。传说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依赖淮盐的湘鄂两地无盐可食，清政府遂下令川盐济楚。当时，施济桥就是川盐济楚的必经之地，它也因此被誉为“东川保障”。

施济桥不仅位于交通要塞，也曾因其宁静秀美的风姿，颇获诗人青睐。“十里晚烟迷古渡，二月分明印长桥。”这是清代荣昌教谕谢金元对荣昌“八景”之一“虹桥印月”的真实写照，“虹桥”即是老施济桥。民国时期，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路过荣昌时，也曾写下了一首题为《施济桥》的诗篇。诗人这样形容施济桥的美景：“山水光辉映，吾行御空飞。不觉两岸远，但来天香微……”

老桥一侧，有一座与它“并肩”的新桥，这座桥比施济老桥高出一大截，桥上车水马龙。当地人告诉记者，施济桥历时近千年，经过多次维修，已成危桥。1998年1月15日，荣昌新建施济桥，将成渝公路改道新桥通过，这才有了如今新旧施济桥双桥辉映的场景。

时光不居，岁月如流。夕阳下的施济老桥低矮陈旧，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，静静伫立；一旁的新桥高大伟岸，静静守护着近千岁的“大哥”。廖正礼说，这正是东大路留下的时代印迹。

高瓷铺 农闲时古驿道上的挑夫日以千计

从荣昌城区沿着成渝公路一路西行，约5公里后，记者便到了广顺街道高瓷村，这个村的村名就是由古驿道上的高瓷铺而来。

安富铺 小姐绣楼成为临街风景

再往西行，记者就到了川渝交界处的安富街道。

安富建于清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年），距今已有318年历史。当时，清朝连接成渝出川的古驿道经过安富，并设有驿站，供来往人员食宿之用。

“老路中间是一块长石板，两边各压着一块条石。”高瓷村九组75岁的村民曾高富告诉记者，“我爷爷、我爸爸和我都曾是挑夫，在这条路上讨过生活。”

廖正礼告诉记者，荣昌境内的成渝古驿道路面宽敞平坦，从明清到民国年间，这条路上的官轿、马车、挑夫络绎不绝，很是热闹，是成渝间最直接的陆上交通线。对此，《荣昌县志》上亦有记载，从明清时期开始，这条路就是挑夫的谋生路，特别是每年冬季农闲至次年春耕前，路上的挑夫日以千计。挑夫们多是贫苦平民，他们沿着成渝古驿道，把荣昌的陶罐、麻布等特产挑到内江、自贡、成都等地，再换回粮食、盐、白糖等供当地坐商销售。

“出门一担货，回来一担粮。”曾高富说，高瓷村盛产陶土，当地人用它来烧制钵、坛、缸、罐等生活陶器，挑夫们便挑着窑货，沿着这条路远上川北讨生活。挑窑货的扁担是特制的，两头各有个尖尖，防止担绳滑下来，窑货被摔坏。“沿途挑夫‘哼哼唧唧’，扁担‘咯咯吱吱’，路上好不热闹。”曾高富吧吧唧唧地抽着叶子烟，眯缝着布满皱纹的眼睛，陷入回忆。

“成都人最喜欢我们荣昌的陶罐，用陶罐装粮食透气，老鼠又钻不进去。”曾高富告诉记者，成都平原盛产粮食，当地人便用粮食来换陶罐，一挑陶罐八九十斤，能换一百二十斤谷子，返程的担子倒比去时还沉些。

荣昌以麻布闻名，清朝时更是达到鼎盛，英国外交官爱德华·科尔伯恩·巴伯在1881年所著的《华西旅行考察记》里，写到荣昌时就提起了麻布。他说：“这个地方的主要产业是制造麻布，我们沿途屡屡看到人们把大量的麻布漂白后摊在岸边晒干。”而一条建在古驿道上的小巷在清代专门卖麻线，麻线是麻布的主要原料，于是，这条街生意红火，人们便管它叫做“麻线市”，在当时颇有声名。

从麻线市往西走，过去古驿道必经之地——檬梓桥早已不见踪影，取代它的是一座新的檬梓桥，桥下有井，正在檬梓河边。井口用栏杆保护起来，挂有“荣昌区文物保护单位”的铭牌。记者走近一看，井水距井口不到50厘米，清澈见底。当地居民告诉记者，这口井名叫箩筲井，当年是檬梓桥一带居民的主要水源，一年四季清清凉凉。令人称奇的是，离箩筲井两三米的位置就是檬梓河，相隔如此之近，但河水水源和井水水源完全不同，这样的现象被当地人戏称为“井水不犯河水”。